

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刍议

郭 齐 勇

随着“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和“一国两制”等基本国策的确立和贯彻，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密切相连的一场文化研究的热潮正在中华大地上兴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重新评价和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的“热门”。热门中的“热点”是在改革实践中逐渐凸现出来的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与文化传统的相互关系。关于这个问题，时下海内外学术界已经出现了正常的分歧和争鸣。其中主要有这样几种看法：以杜维明等人为代表的、针对马克思·韦伯(Max Weber)理论的“儒学复兴”说，以甘阳等人代表的、针对“儒学复兴”说的“根本的改造与彻底的重建传统”的理论，以及以李泽厚等人代表的、针对“中体西用”和“西体西用”的“西体中用”说。^①本文与以上三说立异，在对“现代化”和“传统文化”及其相互关系作出界定和探讨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综合”说。所谓“新的综合”，概言之，即是说，探寻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必须跳出简单化的中西两极对立和体用割裂的思想方式；中国文化的前景，既不是传统的连根拔除、全盘推翻，也不是传统的自我复归、卷土重来，而是中西文化在初步结合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母体上，从全方位，不分主从地、更加广泛、深入地相互渗透、补充和融合。

—

首先，我们对“儒学复兴”、“彻底重建”、“西体中用”三说加以评析。

“儒学复兴”说以海外华裔学者余英时、杜维明、成中英、金耀基、郑彝元等为代表，而以杜维明在海内宣传最多。他们认为，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这两部影响甚大的著作中，关于中国缺乏近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学基础、与基督教(特别是加尔文教)精神取向迥异的儒家伦理和道家价值系统无法开出现代化的工业格局的论断，需要重新反省。他们认为，“五四”时代第一流的思想家面临的是一元的、单线的现代化模式——西化，而现在，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思考模式已逐渐被多元的思考模式所取代。近二十年日本、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东亚五地区的经济起飞，对于韦伯理论发出挑战。东亚经济奇迹可以从结构和文化两个层面上加以解释：从结构上来看，东亚之不同于或优越于西方，主要在于它的政治安定和处于决策层的优异分子，包括计划专家、经济学家、银行家和行政人员组成的“职业官僚”确定并不断改善的工商政策，也即是政府的明智的行政工程的结果。有力的国家干预与发达的商品经济、先进的科学技术密切结合起来。从文化上

来看，东亚社会属中国文化圈，而中国文化的主导成份是儒学。按日本方式结合东西文化，把儒家伦理与西方的经济民主、个性自由相融合，既重视个人才能、胆略和气魄，又以和谐的心理调节和人际关系调节，充分发挥社团、群体的聪明才智。他们把东亚资本主义命名为“儒家资本主义”，把儒家伦理作为解释东亚经济奇迹的深层原因和东亚社会现代化的源头活水。他们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的命题。所谓“认同”，是一种自我定义、自我认识。文化认同，即对传统进行自觉的群体的同时又是批判的继承和创造，也即是对外来文化进行自觉的群体的选择和吸取。因此，他们提出，需要重新估价中国文化，特别是它的“内在超越道路”和“人文精神”在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中的价值，反省“五四”时期“全盘西化”的片面和极端，对于西方文化的挑战作出创见性的回应。尽管他们声言这绝不是回到“中体西用”，却又展望儒学将继汉唐和宋明之后，获得第三期发展。②

与“儒学复兴”说针锋相对的，是一些青年同志提出的从根本上挣脱、改造传统并彻底的重建传统的主张。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甘阳、金观涛、黄克剑等。他们认为，不能把传统的儒道文化本身看成是中国文化的整体系统，然后再以此为本位来吸取、同化新的文化因素。相反，必须全力创建中国文化的现代系统，并使儒家文化下降为仅仅只是这个系统中的一个次要的、从属的成份。他们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本身的发展，使中国传统的文化形态再也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了。因此，问题的实质根本不在于中西文化的差异有多大，而在于中国文化必须挣脱其传统形态，大踏步地走向现代形态。所谓“批判的继承”并不只是在过去已经存在的东西中挑挑拣拣，而是要对它们的整体进行根本的改造和彻底的重建。继承发扬“传统”的最强劲手段，恰恰就是“反传统”！因为要建立现代新文化系统的第一步，必然是首先全力动摇、震荡、瓦解、消除旧的系统，舍此别无他路。他们还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超稳定、封闭性的系统，根本不可能产生任何启蒙，也不可能通过自我批判进行更新，只有靠引进外来文化，从而创造出过去的中国人不曾有过的新的现代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③

介乎“儒学复兴”说和“彻底重建”说之间的是“西体中用”说。此说由于光远、黎澍率先提出，而李泽厚近来论之甚详。李泽厚借用人类学本体论中的“社会存在的本体”概念，认为“体”有两重含义，一是工艺社会结构，是外在的物质文明结构；一是文化心理结构，是内在的精神文明结构。他说，现代物质文明是全世界所共同走的道路，它首先是从西方来的；我国社会的本体意识——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科学理论也是从西方来的。他说，“西体”就是现代化，“中用”就是怎样结合实际运用于中国，也就是中国化。同时，李泽厚又认为，儒学作为几千年来社会统治意识，已成为中国文化心理结构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儒学传统“天人合一”论，强调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强调人际的和谐稳定，强调人的身心的和谐愉快，可以在新的现代化条件下加以继承、改造和发展，从而对世界文化作出新的贡献。④

笔者认为，以上三种意见都有合理的层面，不应当把这些意见简单地归结为华夏中心主义的“国粹论”或欧洲中心主义的“西化论”。近代以来，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总是与中国社会如何走向世界密切相联。魏源的“师夷制夷”、早期改良派的“中本西末”、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胡适的“全盘西化”、陶希圣的“本位文化”等等，是不同历史阶段的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的撞击作出的不同的，然而又是正常的反应和选择。八十年代关于中国文化问题的讨论，决不是上世纪末维新派与洋务派关于“中体西用”问题论战、“五四”前后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与杜亚泉、梁漱溟、梁启超等关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二十年代丁文江等与张君勱等关于科学与人生观问题论战、三十年代胡适等与陶希圣等关于本位文化问题论战的简单的重复。这是因为时代不同了，人们的思维水准提高了。仅就文化背景而论，自抗战以来，中西

文化已经扬弃了相互对抗、排斥而达到了融合的阶段。三四十年代，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初步结合，另一方面整个文化界产生了中西文化融合的、中国人独创的、形式多样的哲学体系和文艺作品。八十年代海禁重开，可以从更高的层次上复归四十年代。就目前文化讨论中出现的各派意见来看，其实都是围绕着怎样更好地融合中西文化，选择既不脱离世界文明发展大道，又不脱离民族文化传统的最佳模式而展开的。

笔者认为，主张“儒学复兴”说的海外华裔学者关于现代化决不等于西化的论断及对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特殊价值的发掘是正确的和有益的。但是，“儒学复兴”说至少有四点谬误：第一、把多元的、多民族的、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上层和民间的中国文化简单地归结为儒家文化；第二、在造成东亚五地区经济起飞的经济的、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复杂原因中过于强调了文化因素并把它等同于儒家伦理；第三、贬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开辟了中国文化新生面的历史功绩（尽管他们有片面性）；第四、低估了儒家文化对于历史和现实所造成的巨大的负面的影响。

笔者肯认在多元的民族传统文化中，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儒家文化对于我们民族性格的塑造起过较大的作用，唯其如此，才断不能苟同“复兴”之说。尽管儒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面貌，在同一历史时期也有政治化的儒者和努力以道德理想转化政治的儒者的不同，但是，作为积淀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在下意识层里起作用的儒家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却是一致的。其中确有一些糟粕，例如，儒学的注经传统和内倾心理容易导致教条主义和独断论滋生，儒学的重履践、轻理论、少逻辑、多证悟，又容易导致经验主义泛滥。秦汉以降，儒学的结构和功能从根本上有利于维护封建王权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这一传统与现在仍有生命力的小农意识、宗法观念、官僚作风、文牍主义等等相结合，势必构成实现现代化的巨大阻力。这样说并不是要把儒学与封建文化划上等号，也不意味着否定儒学特别是先秦儒学中的尊生、健动、重人、尚德的价值。如果我们现实感强一些，了解到我们的干部和民众由于科学与民主素养的低下所带来的积弊，就会知道“复兴儒学”方案的荒唐。

笔者充分理解甘阳等同志提出“彻底重建”论的心情。但是，不能不指出，此说在如下问题上疏了神：第一、把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文化，而这二者是不能划等号的；第二、把传统与现代截然对立起来，而事实上传统并不总是维护保守的现实，现代化产生于传统的合理层面；第三、忽视了文化史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即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思维水平的提高，可以不断地发现和发掘传统文化的潜在价值。面对现代化的文化抉择，我们需要冷静的反思和科学的分析。新的文化系统是不能凭空创造出来的，列宁批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一些意见仍然值得我们珍视。吸收和改造几千年来中外各民族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是创建新文化的前提和基础。越是有民族性的文化，越有生命力和世界意义。优秀的文化遗产必须继承和发扬，为人们习见的无害和有用的东西也需要保留和改造，即便是传统文化中的腐朽的东西，也不是想抛弃就能抛弃的。对于愚昧、落后现象和封建遗毒，我们主张进行韧性的战斗。通过几代甚至十几代知识分子的努力，结合国情进行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启蒙教育，输入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系统，提高国民的文化素养，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异常艰苦的重大工程，来不得半点急躁。

笔者认为，李泽厚同志的“西体中用”也不是一个科学的口号。任何文化系统的本体和功能都是不能割裂的，关于这一点，严复和熊十力早有论述。我国目前的物质基础、生产方式、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与其说是“西体”，毋宁说是“中西结合体”。一百多年以来，我国的实业也好、体制也好、观念也好，并不是西方或苏联的简单移植，而是融进了我们民族的实践

经验和思想成果。尽管李泽厚的“体”与张之洞的“体”不同，然而思想框架却是一致的。中西文化的互为体用之说，很难避免割裂体用，甚至可能重蹈“全盘西化”或“本位文化”的覆辙。“西体中用”说既不能概括上世纪末以来中西文化交融的历史，也不能预测下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前景。我以为，正确的说法是：在中西文化初步结合的母体上，发挥其功用，进一步把西方自然科学、政经体制、观念方法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和民族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巩固其体，壮大其体。这其实是我们党正在做的工作。

二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模式既然不会是“儒学复兴”、“彻底重建”和“西体中用”，那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以为，很可能是中西文化不分主从地，更加广泛和深入地相互渗透、补充、综合，是自十七世纪以来中国文化西方化和西方文化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姑名之曰：“新的综合”。中国文化的前景既不是传统文化的复归，也不是传统文化的中断；既不是中国文化为主体吃掉（消化）西方文化，也不是以西方文化为体、为质，而以中国文化为用、为形。回顾“汉明求法”以迄唐宋时期中印文化交融的历史，不难发现本土文化与异质文化的融合从来都是渗透力很强的双向交流运动，没有主从、本末、体用之分。佛教的思辨哲理、雕塑绘画、通俗文学、建筑艺术、乃至音韵、医学、瑜伽等等，并没有吃掉中国文化，也没有被吃，而是与固有文化融合一体，难于分辨了。可知中西文化的融合也将是充满着矛盾纠葛、历时颇为久远，不断重新理解和发现对方的新的价值，并最终浑融无别的。探寻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必须跳出简单化的中西两极对立和体用割裂的思想方式。

三

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并不等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由于我们的近代化问题没有解决好，人们往往以西方近代文化作为参考系，作为价值尺度，来衡量中国文化。看来有必要对“现代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作出界定。

“现代化”范畴的涵盖面很广。它决不仅仅指生产能力和科技水平，同时还包容着社会政治法律结构、经济教育管理体制和人们的观念形态、行为模式、道德规范等等。很清楚，现代化不仅意味着发展物质技术基础，而且意味着同时进行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制度的改革和更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理论思维方式、审美情趣、道德风貌、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的更新。现代化不仅是“物”的现代化，同时是“人”的现代化，是人的全面发展。用一种广义的文化观来看，其实就是“文化的现代化”。这样一个多层次的全相现代化的要求，决不是西方近代文化所能包容的，决不是科学和民主所能概括的，甚至也不是西方现代文化所能取代的。我国的现代化，不同于西欧、北美，不同于东欧、苏联，不同于东亚、日本，也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所谓“中国特色”，是一种内在的特色，不是外在的形式。“现代化”范畴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趋势与中华民族的民族个性的有机结合。因此，它与“传统文化”有着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一样，也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涵盖面很广的范畴。从来没有什么一层不变的传统。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在华夏族与夷狄族的文化长期撞击、融合而形成的汉文化的基础上，继续与各兄弟民族文化拒斥、碰撞、融合的结果。不唯如此，今天的

中华民族文化，又是华夏文化和汉文化与人类其他文化圈的异质文化，主要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交融的结果。时下有的论者臆断中国文化是什么“封闭型”的，“大陆型”的，是不符合事实的。恰恰相反，华夏文化、汉文化长期坚持兼收并蓄的开放传统，不断引进、吸收、融合域内外各民族文化。另一方面，从来没有什么单一的传统文化，它是多元素的综合体，除了时代的差异，还有民族、地域的差异。例如，在同一先秦时期出现了风貌迥异的区域文化——邹鲁、三晋、燕齐、荆楚文化，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后来作为汉文化基因的阴阳、儒、道、墨、法、名、兵、农等诸子百家文化。此外，除了汉文化，还有少数民族文化；除了上层文化，还有下层的、民间的文化。总之，无论从纵向还是从横向考察，“传统文化”总是具体的、历史的、丰富的、多元的，是多层次的立体网络。这对我们发展新文化提供了多样的选择性，也为吸取、融合外来文化提供了广阔的背景。

传统文化是流动的、多样的，在流动之中有没有常住的一面呢？在多样之中有没有统一的一面呢？尽管每个时代的、不同民族和地域的文化都在不断吸取新鲜血液，艰难地克服堕性，新陈代谢，改变自身的内容和形式，然就整个中华文化而言，仍有一个恒常的东西在其中。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凝聚力和它的本质特征。

中华民族有一种刚健奋进、礼让互助、克己奉公的精神，这是几千年形成的我们民族的灵魂。相对地说，对于后期封建社会影响最广大、最深远、直到今天仍然不见形迹地起着这样那样作用的是宋明道学（又称理学）。从唐中叶开始到明代完成的道学，是儒家、道家文化与（印度和中国的）佛家文化融合的产物，是元明清三代的统治思想，浸透了社会的上层和下层，其社会作用远远胜过了任何反理学思潮。这就是为什么一提到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必然涉及宋明道学的原因。它有这样一些特点：整体流行的、自然与人事不二的宇宙图式，自强不息、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重义轻利、以理节欲的道德规范，中庸平衡、圆熟和谐的处世原则，注重意境的审美情趣，综合证悟、重实践轻理论的认识趋向，血亲伦常、等级有序的社会管理方式。任何笼统抽象的说明都不可能十分准确完备，以上概括也是一样。其所以仍要这么做，是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集精粹与糟粕于一身的宋明道学，至今还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起着作用，成为我们走向现代化的文化土壤，不能不认真对待。

近代史和社会现实昭示我们，必须调整传统文化结构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在调整中发现新传统；必须警惕深层心理中某些意识对现代化建设的干扰，在批判中埋葬旧传统。

如前所述，传统本身是与时俱进的，每个时代对传统文化和它的某些成份都能发现新的意义和作出新的解释。“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克罗齐的这个论断很有见地。传统与现代不是水火不容、绝对对立的。传统中的一些内容是现代的胚胎；另一些内容由于历史的发展而失去了存在理由，变成了历史的包袱；还有一些内容则成为“新大陆”而不断被人们发现、开掘。传统与现代之间有冲击，但也有回应、交叉、衔接、结合和转化。因此，它们的对立只有相对的意义。

站在现代文化水平上，以新的视角反观中国丰富多样的传统文化，比站在西方近代文化水平上作出的判断更有意义。这样变换一下参照系，可以发现传统中的许多珍宝。这些珍宝将有益于现代化与后现代化。例如，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模糊整体的体证直觉思维方式，与经典力学的模式很不相称，但与现代物理学的场论框架相当一致。海森堡、玻尔等著名科学家发现它们与量子力学的哲学本质之间有着某种确定的联系。又如，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法制建设，如果站在西方近代法制的思维水平上，很可能把中国古代法律说得一无是处。笔者同意在近期内充分学习西方法制，克服立法、司法、行政不分，党、政、德、法不分的局面，但

是，从长远来看，我国以伦理道德规范从法外进行调整的传统，恐怕可以纳入现代化的法律意识之中。还如，现在我们都照搬西方的经济管理，可不可以建立中国式的管理模式呢？容摄美国的讲求功效、注重个人创造力、责任心、荣誉感，和日本的家族主义、团结生存和心理调节，加上我们民族的注重道义、经权互通、和谐统一、动态平衡等，把权、责、义、利结合起来，把个人与群体、行政调节和经济调节结合起来。

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再发掘是有赖于西方现代学术文化和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我们也不能忽视西方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商业主义的影响，不能忽视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加快造成的种种异化现象。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和讲求个人身心修养的传统的确有利于统一环境与个体，维护人性的独立和完整。经过改造和调节，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因素是可以为现代化服务，与现代化同步前进的。

另一方面，传统与现代又不是可以混同的，它们之间又有一定的界限。我们又不能把后现代化的问题过早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传统文化中的深层心理意识的作用是相当顽强的。就象康有为、严复这样的传播西学的功臣，最终都难免被旧传统淹没。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应当警惕旧传统的故态复萌，或者如十年浩劫时期那样以各式各样崭新名目掩盖着的旧的内容。改造国民性的最好方法是加速现代化建设。当务之急是扬弃传统文化中堕性的层面，发展商品生产，实行民主政治，繁荣多元文化。

文化内在结构的三层面——物质文化(科学技术等)、制度文化(政经体制等)和观念文化(哲学信念等)的变革是同步的。我们必须以健康的心态在改革与开放中作出自己的选择，摸索出既不脱离人类文明大道，又不脱离民族文化传统的新的发展模式，即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注释：

① 与“儒学复兴”、“彻底重建”和“西体中用”说不同的，还有萧萐父提出的“哲学启蒙”说，认为应当继承十七世纪兴起的反对宋明理学的早期启蒙思潮，自觉地更深广地有选择地吸取消化外来文化，完成近代哲学启蒙的补课任务。见萧著《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一期)和《关于改革的历史反思》(《武汉大学学报》1985年第二期)。

② 参见杜维明著《中国文化的认同与创新》和成中英著《论世界哲学之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均为提交1986年元月复旦大学举办的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余英时著《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4年版)；金耀基著《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韦伯学说的重探》(《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汇编》，香港中文大学1984年版)；郑彝元著《儒家思想导论》(曼谷时中出版社1984年版)。

③ 参见甘阳著《传统、时间性与未来》(《读书》1986年第2期)和《说中西古今文化之争》(《青年论坛》1986年3月号)。

④ 参见李泽厚著《中国思想史杂谈》(《复旦大学学报》1985年第5期)。

(作者附识：1986年3月和4月，作者应哲学系研究生会和我校青年教师科协的邀请，在校内作了两场关于“文化热”的讲演。本文系据讲演稿整理而成，并被“全国中青年哲学工作者最新成果交流会”论文评委会评选为出席八月屯溪会议的入选论文。)